

第五屆「道風」學術獎評選結果公報

敝所為促進中國大陸學術思想界的基督教文化研究，推動漢語神學的發展，鼓勵東西方思想文化的交流，倡導並表彰在基督教研究學術領域內兼具深度與廣度的原創性研究，自一九九九年設立道風學術獎。此獎項由香港道風山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提供，並承擔獎項評選的日常行政及組織工作。是次評審作品要求是在中國大陸正式出版的學術著作，出版時間從二〇〇四年一月一日到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是屆評審程序，設推薦委員會及評選委員會兩個獨立機制，以互不干涉的原則甄選。首先由一個較廣大的推薦委員會推薦優質



原著及譯著若干部進入評選機制，此屆推薦委員會十九位成員乃來自國內多間重要高校基督教教研機構，每位共推薦三部原著和三部譯著，經點票後最高票數六位候選者再進入由兩岸三地知名學人成立之評審委員會進行評選。是屆評審包括：李天綱教授（復旦大學）、李秋零教授（中國人民大學）、高師寧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溫偉耀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卓新平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此屆評審委員會主席）、賴品超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林鴻信教授（台灣神學院）、包利民教授（浙江大學）、曾慶豹教授（台灣中原大學）及傅有德教授（山東大學）。經為時數月的評審過程後，周偉馳著的《奧古斯丁的基督教思想》和魏育青譯的《羅馬書釋義》（巴特著）分別獲得徐光啟著作獎和艾香德翻譯獎，作者和譯者得獎感言分別撮於下。

徐光啟著作獎

周偉馳，《奧古斯丁的基督教思想》（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在今日洶湧的信息之海中，一本書就好比一個漂流瓶，被撿到的機會委實不多。而《奧古斯丁的基督教思想》一書不僅被人撿到，還給它的作者帶回了一個獎項，堪稱一個意外的驚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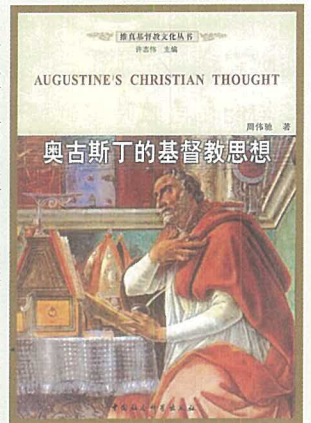
這與其說是對一個作者的獎勵，不如說是對奧古斯丁天才的讚賞。他就如一顆遙遠的巨星，其明亮的光輝要在一千六百年後才能穿過地理、語言、文化和偏見的引力場，來到現代中文世界。

如果說這本書尚有值得一讀之處，那是因為作者對待奧古斯丁思想就像敲打核桃，剝掉它的硬殼，取出柔軟的核仁。教父和經院哲學家身處希臘哲學傳統中，不得不採用僵硬的名相，但他們表述的內容仍舊是信仰教義。這跟理學家採用佛道的語言建構儒家的思想沒有多少不同。

對於古代思想家，不了解其生命軌迹，就難以把握其文字墨迹，因為其時哲學尚是一種體道的生活方式，而不是現代大學裏的一個學科。所以，

通過追索其生命體驗，將其思想放回到其處境中，重構其活潑形成的過程，有利於我們了解其基本信念，貼近化石在活着時的形態。也許奧古斯丁在歷史教材中是僵硬而崇高的聖人，但只要隨便翻開他的一本書，便能感到生活的氣息撲面而來。他無疑是古代世界裏的「第一個現代人」。

我把自己定位成一個基督教思想的研究者，對於研究對象的態度是「同情之了解、客觀之分析」：態



度上有同情，但在分析上儘量客觀中立。這種情形，跟一個現代學者研究其他的宗教信仰，並沒有多大的不同。

對這本書我亦感到尚有遺憾。遺憾的是我對於中國和基督教這兩個傳統的理解都尚不夠深入（二者是互相加深和促進的），因此對奧古斯丁的理解還會有許多欠缺和偏差。此外，在表達形式上亦有待改進，如應在注解中加上一些重要的拉丁原文，所幸的是這些均能在再版時得到彌補。

最後，我要對研究所的楊熙楠先生和陳家富博士、參與推薦和評選的各位海內外評委、維真學院的許志偉教授、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卓新平教授的支持和關心表示感謝。

艾香德翻譯獎

魏育青譯（巴特著），《羅馬書釋義》（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設立「艾香德學術翻譯獎」，旨在促進基督教學術著作翻譯事業的發展。拙譯《羅馬書釋義》一書此次得獎，深感受之有愧，只能理解為學術委員會諸位委員的鼓勵，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

我是從事所謂「日耳曼學」即德語語言文學的教學和研究的。與德語國家的母語日耳曼學者不同，翻譯工作也是我們工作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有幸接受了《羅馬書釋義》的翻譯工作，因為知道該書在基督教思想史的深遠意義，所以集中了相當的時間和精力，努力克服了種種困難，歷時一年有餘，終於完成了這本巨著的翻譯。現在回頭來看，覺得這比較漫長的「帶着鏢鏢跳舞」的過程可以說是苦中有樂。

在翻譯時會出現某些可歸因於源語與譯入語各自特點的困難，比如「簡」與「繁」。持「理想化對立」論認為，漢語不是屈折語、缺乏嚴密形態變化，語境依賴性、語義和語用因素的作用較為突出。在德語原文中是剛性的必要成分，在彈性的漢語譯文中有時可能被視不妨刪削的「冗餘」。漢語在傳統上尚簡，在和合本中也有所體現。《羅馬書釋義》中有些

和合本省去的字眼，卻是巴特展開討論的對象。必須按照某一權威譯本翻譯原文中的引文時，譯者更是「帶着鏢鏢跳舞」。《羅馬書釋義》中所引的《聖經》語句譯時全從和合本，而和合本不僅與今天多數讀者的漢語語感已有相當距離，而且與巴特所用的《聖經》版本在文句和分節上都不盡一致。在這種情況下必須有所增益，以一方面保留和合本的表達，另一方面不偏離巴特文中的所指。

不過這些張力關係只是相對而言，但即使主體性明顯的漢語也是有法可依的，只不過這「法」不是德語這類語言的形態變化法



則，相對而言比較隱蔽罷了。尚簡的漢語完全有將邏輯關係等在表層結構上加以詳細標識、構建複雜句型的可能性。至於是否習慣運用這種可能性，是否喜歡言必盡意，那是另外一個問題。相反，德語只要「得意」也可「忘形」。《羅馬書釋義》中也有這樣的例子。

翻譯既是跨語言、也是跨文化的交際過程。我們是否定文化因素的作用突出語言交際的絕對可能性呢，還是突出文化因素不可克服的干擾？確實也存在以翻譯手段難以克服的文化理解障礙。正如儒家概念「仁」難以在詞彙層面上用德語表達，將《羅馬書釋義》中的 Treue 和 Gerechtigkeit 譯成「信」和「義」也可能在漢譯本讀者的腦海裏引起與中國文化相關的聯想，與原文所指不一定完全疊合。要把一個朦朧概念完整的含義和當時在上下文中的含義同時再現出來，既不損害其一體性又不偏離其語境性，對譯者來說更是殊非易事。

在翻譯過程中我雖然盡了努力，但很多問題還是沒有解決，譯本中仍有許多不完美的，說此獎受之有愧，絕非謙辭。在翻譯《羅馬書釋義》這部神學名著中既有艱辛，也享受到不少精神上的快樂。我願為翻譯事業的發展和繁榮盡綿薄之力，再次感謝諸位的肯定和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的鼓勵。

謝謝大家！■